

习坎庸言

罗庸

鸭池十讲

书
老
好
不

02

新星出版社
NEW STAR PRESS

习坎庸言

鸭池十讲

罗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习坎庸言 鸭池十讲/罗庸著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5.5

ISBN 978-7-5133-1723-8

I. ①习… II. ①罗… III. ①儒学—文集 IV. ①B222.05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50585号

习坎庸言 鸭池十讲

罗庸 著

责任编辑: 秦千里

特约编辑: 闫 妮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封面设计: hanyindesign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11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90mm × 1194mm 1/32

印 张: 7.25

字 数: 145千字

版 次: 2015年5月第一版 2015年5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978-7-5133-1723-8

定 价: 35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出版前言

民国是一个战乱频仍的时期，也是一个学者辈出的时代。特别是八年抗战中最为艰苦的西南联合大学，更是聚集了一批学贯中西的学者大师。一些学者或因其倜傥风流，或因其著作等身，或因其特殊的符号意义，至今仍为人所乐道；也有一些学者，虽然同样学富五车，却因英年早逝或惜墨如金，而几至无闻。罗庸先生即是后者之一员。

罗庸先生（1900—1950）是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和国学家。字膺中，号习坎，笔名有耘人、佗陵、修梅等，是清初扬州八怪之一“两峰山人”罗聘的后人。出生于北京。17岁进入北大文科国文门学习。后又进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进修研究生。毕业后在教育部任职，与鲁迅是同事。又先后任教于北大、女师大、北师大、中山大学和浙江大学。1932年回到北京大学，任国文系教授。抗战全面爆发后，北大、清华、南开三所大学南迁，于1938年在昆明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，罗庸先生即在此任教授、文科研究所导师、中文系主任，讲授《中国文学史》《诗经》《楚辞》等课程。

时值抗战，物价飞涨，教授们大都生活困顿，教学之余，不得不各展所长，补贴家用。王力先生开始写小品文换稿费；

闻一多会刻图章，每天忙个不休；潘光旦教务长曾张夹设笼捕鼠，由夫人做成菜。罗庸擅长诗词骈文，据说著名的西南联大校歌即出于他手；罗庸书法也佳，由冯友兰先生拟稿、罗庸书丹的《西南联大纪念碑文》堪称双璧。但罗庸却属“一簞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”，而“不改其乐”者。1942年春，一场大火把他的家当烧个精光，他不以为意，还把联大中文系的几位教师和研究生召集到一起，“共约讲习之会”，“旨在温故知新，克己复礼，以免独学无友”。讲课历时四个月，主题包孕广博，分为勉学、识仁、六艺、诸史、九流、理学、经世、文章、种族、文化、质文、礼乐、乡党、学校、儒侠、风俗等内外学术16篇，由学生李觐高根据笔记整理，是为《习坎庸言》。

罗庸先生在昆明期间另一系统的演讲后来也被整理成书，这就是《鸭池十讲》。收其讲演稿十篇。因昆明的滇池在元代名鸭池，“以记地故，因题此名”。十篇文章内容丰富，论述精辟。谈儒，论诗，谈士，娓娓道来，足见其学识之博，见解之深，更可窥其于国忧家难之即，对民族精神之阐释。

抗战胜利后，西南联大结束，三校北归时，罗先生却决定留在昆明组建师范学院，任昆明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兼系主任。1949年赴重庆，在梁漱溟创办的勉仁文学院任教。1950年病逝于重庆北碚。

汪曾祺在《西南联大的中文系》中回忆说：当年在西南联大，“还有一堂叫座的课是罗庸讲杜诗。罗先生上课，不带片纸。不但杜诗能背写在黑板上，连仇注都背出来。”罗庸讲课声音洪亮，引人入胜，又富于风趣，自身陶醉其中，学生更为之神往。有一次讲《楚辞》中的《九歌》，海报一出，连

住在昆明城东的联大工学院的同学也跑到城西来听讲。一间可容百人的教室，坐满了听众，窗外还站着人。罗先生一气讲了两三个小时，夜深才结束。一位听过罗庸讲课的学生回忆，罗先生讲杜诗，“自己仿佛就是杜甫，把诗人在长安慈恩寺塔上所见所闻所感深沉地一一传达出来；用声音，用眼神，用手势，把在高塔向东南西北四方外望所见的远近景物仔细重新描绘出来。他先站在讲台上讲，忽然走下来靠近木格子的窗口，用右手遮着眉毛作外眺状，凝神，一会儿说：‘你们看，那远处就是长安，就是终南山……’”

《习坎庸言》记录者李颀高先生弥留之时，“神游抗战艰苦时期西南联大讲师时代，断断续续，长达数日”，醒后言及《习坎庸言》已为孤本，嘱其子“必予刊印，以续绝学”。李安国先生遵父嘱，“即予研读，先求断句，再究连贯”，终于成书。本社此次重新出版，对原书仍取“不加一字取舍”的原则，但广泛参阅古籍，对引文重新查证标点，以期更符合罗庸先生原意。罗先生一生超然物外，志趣高雅，潜心学问，温文儒雅，佛学、儒学造诣精深，至今已难觅能出其右者，却英年早逝，只有《习坎庸言》和《鸭池十讲》两本薄薄的专著。今将两书合为一书，以飨读者，可更全面地了解罗庸先生对文化学术之深悟，缅怀当年西南联大名师之风采，更希望于此对读者了解和领悟中国之文化及民族之精神有所裨益。

本书编者
2015年3月

好书不老 常读常新

目 录

习坎庸言

缘 起 / 002

规 约 / 003

内篇一 勉学 / 005

内篇二 识仁 / 011

内篇三 六艺 / 019

内篇四 诸史 / 029

内篇五 九流 / 046

内篇六 理学 / 052

内篇七 经世 / 059

内篇八 文章 / 068

外篇一 种族 / 079

- 外篇二 文化 / 084
外篇三 质文 / 093
外篇四 礼乐 / 102
外篇五 乡党 / 111
外篇六 学校 / 117
外篇七 儒侠 / 123
外篇八 风俗 / 128
后 记 / 133

鸭池十讲

- 前 记 / 137
一 我与《论语》 / 139
二 儒家的根本精神 / 147
三 论为己之学 / 151
四 感与思 / 155
五 国文教学与人格陶冶 / 163
六 诗人 / 178
七 思无邪 / 188
八 诗的境界 / 193
九 少陵诗论 / 198
十 欣遇 / 218

习坎庸言

缘 起

三十一年^①春，余将释三年之丧，朝夕礼奠之暇，重亲旧业。时避寇昆明，既逾四载，国忧家难，学殖日荒。同游诸友，亦或愤悱无靖献于时，因共约为讲习之会，爰次第内外学术为十六篇，每七日休沐，集而讲之。易坎之象曰：“水洊至，习坎，君子以常德行，习教事。”中庸曰：“君子之道四，丘未能一焉：所求乎子，以事父未能也；所求乎臣，以事君未能也；所求乎弟，以事兄未能也；所求乎朋友，先施之未能也。庸德之行，庸言之谨，有所不足，不敢不勉，有余不敢尽。言顾行，行顾言，君子胡不慥慥尔。”今之讲论盖有取于此云。

① 三十一年，即中华民国 31 年（1942 年）——编者注。

规 约

一、本讲习旨在温故知新，克己复礼，以免独学无友，非以集会结社著书立说。

二、讲友无定额，但不冀呼召攀援，去来无定，庶符守约有恒之旨。

三、所列十六目包孕广博，非固陋所能尽举，惟是一得之遇，愿与诸友共之，冀收商略之益。子不云乎，多闻阙疑，慎言其余则寡，尤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

四、外篇所及或涉及当世政教大端，但本讲习一本学术主旨，以求为己之学，非敢方人自贤，尤不敢莠言乱政，处士横议之讥庶几免夫。

五、本讲习不为著书立说，讲友但可自行笔记，以资参证，幸毋辄为刊布或轻易示人。

六、本讲习一本默而识之，学而不厌之旨，讲友但可于

燕间互析疑义，幸毋与未参讲习者争持胜义，致启攻讦。

七、学问之道要在日新，本讲习所陈各端，或先后所见不同，得随时补直改定，但必称心而言，庶免动说雷同。

八、橐籥吹万，怒者其谁。虽说本无能说可说，虽念亦无能念可念，庶乎不滞迹象，不落言全。因药发病之夫，庶几可免。深冀诸友共体斯意。

内篇一 勉学

本篇主旨在阐述大学之三纲领、八条目，于此有四点须先说明者。

一、为己之学与格物之学。儒家治学根本态度为为己之学。《论语》：古之学者为己，今之学者为人。孟子曰：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。宋儒之把心放在腔子里，皆是此意。稍有一分鹜外便非为己。设若脚根无线，长随客转，则不足与立矣。自西学输入中土，中国学术遂起变化。西学之特长厥为格物，于是中土为己之学遂沦为心学，与格物之学分途并驰，使学者无所适从。实则中西之学互为首尾，不可强分为两橛也。孟子曰：道，仁与不仁而已。不仁非道，道只有一，道学曷可分属二耶？不能认清为己与格物之为一，则必陷于矛盾与苦闷而不能自拔。

二、通人与专家。古昔学者所孜孜不懈者在求为通人。

王仲任《论衡·超奇篇》：能说一经者为儒生，博览古今者为通人。通人者通贯古今之谓，然通人必资于下学。求为通人而不肯作下学工夫，于是但求省力，如佛家横超三界，因之浮光掠影，只余一空洞架子，转成不通。戊戌政变前以通人自居之旧派多此类也。今之学术界则重专家。培养专家之意，章实斋《文史通义》已早言之，然终不成。今日专家日多，于是求为通人者或目专家为偏，专家亦每病所谓通人者之空疏，无其极至，乃成水火之不相容。然通人与专家不过所治偏全之不同，并非两事。不明乎此，则又无所适从矣。

三、故国之思与古国陈迹。此乃两种作学问态度之不同。如逊清末叶之国粹学者，动多故国之思，对中国之山川景物，小至一草一木、一花一叶亦莫不寄以深厚爱护之情，发之于文章者，低回流连不能自己，其极至于美恶不分，薰莸等视，所谓好仁不好学，其蔽也愚者也。西人之研究中学者，多持科学之态度。科学态度往往流于冷酷，又兼之以帝国主义者视殖民地文化为过去陈迹之态度，为有血性之国民所不能堪。此路当前，何去何从，学人滋惑焉。实则二者不过一出一入之不同，亦不可强分也。

四、农业意识与工业意识。中西治学态度之异造端于此。中人治学精神源于农业意识，而西人（自近百年来为尤甚）则以工业意识为之始基也。吾人称六经曰六艺，称治文章者曰笔耕，曰砚田，自为逊词则称学识荒落，属文无条理则曰枝蔓，曰艺，曰耕，曰砚田，曰荒落，曰枝蔓，莫不由农业术语而来。又如十年树木百年树人，以人比树木，亦农业意识

为之主也。西欧自工业革命而后，文化学术一转而为工业化。中国自欧西接受西洋研究方法，工业术语亦随之东来，如云搜集材料，如云学习工具等，指不胜屈。中国学问以人为主，以物为役，西学则以物为主，以人为役，其轻重迥不相同。初学之士亦以二者判然两途，不知所就，不知二者亦不可强分也。

吾人心理上之矛盾冲突，率可由上述四者寻其源委，是以本篇讲述之前，必先以说明四者始。

古人治学态度，佛教输入中国之前与佛教输入中国之后迥然不同，此则学者所当知。《论语》一书博大精深，字字无病，降而至于《孟子》，则须善读善会，始免过失。如《论语》论学，曰学而时习之，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，如丘焉者，不如丘之好学也。不预拟前面如何而处处由自己入手，处处反省唯恐自己不足者，是以曰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，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，外界一切悉是我师。宋儒所谓不学便老而衰，以不学则将失其赤子之心也。孔子为学只是求道，道者人所当由，而非虚无之对象。子曰：君子学以致其道，朝闻道夕死可矣。学以致道，闻道可死，皆非悬鹄之辨。孔子之学，如此而已。至孟子则不然。一则曰：乃所愿则学孔子也矣，再则曰：舜何人也，予何人也，有为者亦若是。不善学孟则眼前设一偶像，亦步亦趋，未敢稍越规矩，此与佛家学佛之说最相近，亦最易出毛病。盖正足兽伎求之心也。佛教至于中国，不得不以空宗对有宗，亦定转而趋于孔学之意。

眼前预悬一标的而毕其力以赴之，即是功利之见。功利与仁义之分其几甚微，不可不辨。自道家言道，佛家言佛，此病几不可去。宋儒所以反对二氏者在此。善学者唯省察当下一念，当下之念即是学问。功利之心，躁进之心皆心术之大害，务尽去之，乃知学而时习之乐，如此此心始有着落。至于立德立功，成德达材，定否能见用于时，厥有运会存乎其间，尚论古人者不能以成败为衡也。善哉仁义则百病皆消，更不必逐件检察，明乎此，然后三纲八目始可与言。

大学乃礼纪篇名。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朱子改亲民曰新民，并为补格物致知传文。阳明则从古本，于是程朱陆王之学判分为二。愚意此处应从程朱，不从陆王，盖此为义理问题，非文字问题也。

三纲：明德、亲民、至善。性与天道，孔子之所罕言，人人可自致其善，毋待烦言也。下乎孔子者，喜为性善之论，于是性命等于空谈，实性善即明德也。亲民从下文所引康诰改作新民国可，就义理言之，不改亦可。“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”，即亲民之最好注解。止至善之义，自佛教入中国后误解滋多，人人以为有一个至善为高不可攀，若就大学而论则不如是。止至善即止乎中道也。子夏丧子而丧其明，非中道也。子产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，子曰惠而不知为政，亦失中道也。易词言之，明明德乃好学之事，亲民即仁，止至善即从容中道，时时刻刻无道不及，即不离中道，即明德，即亲民，即止于至善。于是乎学问之道备矣。

八目：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